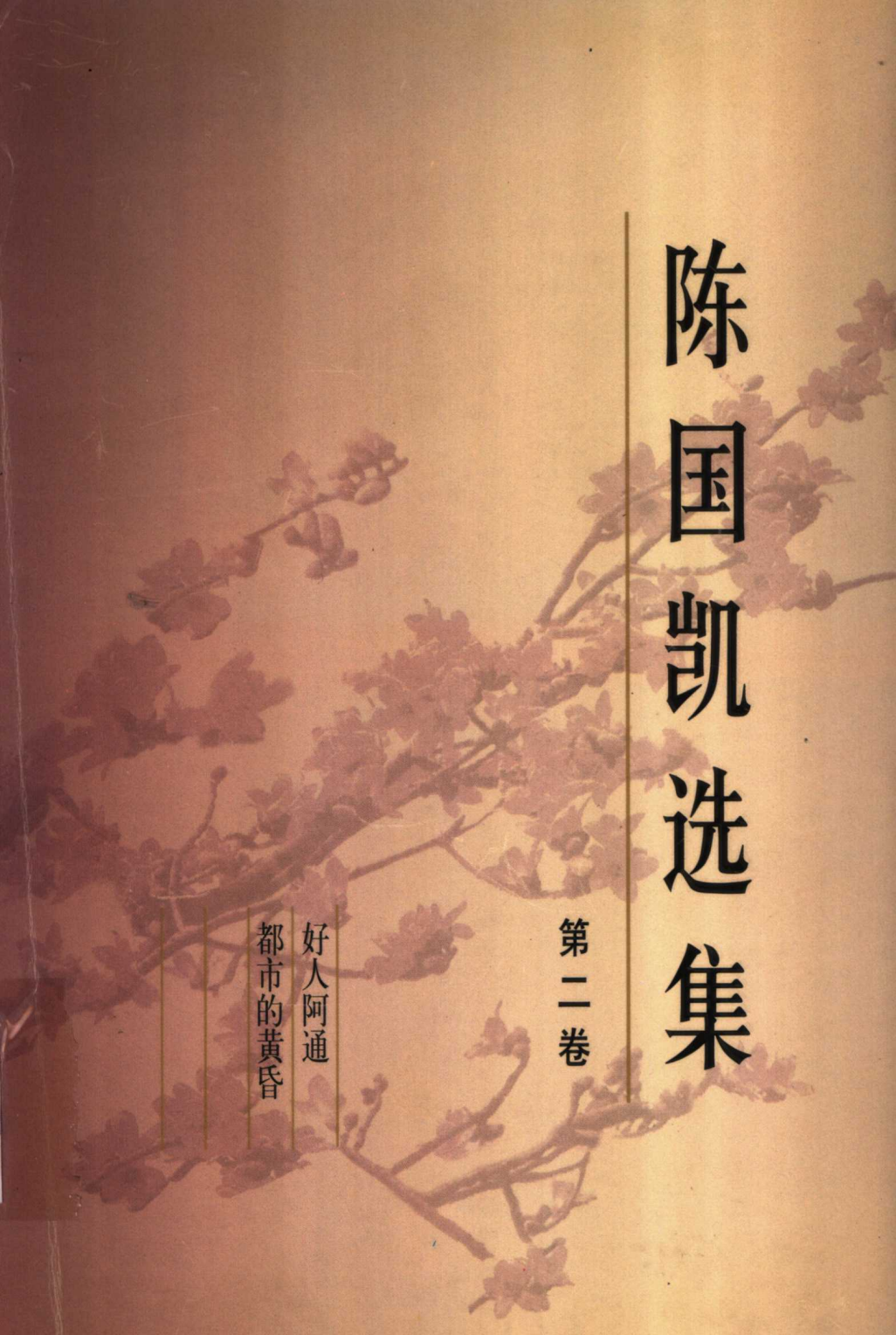




陈国凯选集

第二卷

好人阿通

都市的黄昏

陈国凯选集

第二卷

好人阿通

都市的黄昏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八年·北京



构思中



在书房



在波兰，和波兰作家在一起

目 录

长篇小说

好人阿通	1
都市的黄昏	273

好 人 阿 通

《好人阿通》一九八二年在《花城》第六期发表,后由花城出版社出版。

目 录

题 叙	5
第 一 章 阿通的命名	18
第 二 章 铜锣与爱情	26
第 三 章 “阿哥好比番薯苗”	42
第 四 章 诱惑	55
第 五 章 阿通论共产主义社会	67
第 六 章 时势造英雄	75
第 七 章 大开眼界	87
第 八 章 砸锅	100
第 九 章 英雄抬轿	113
第 十 章 终身大事	129
第十一章 阿通三“滚”	140
第十二章 人海升沉	152
第十三章 神仙弟子的辛酸史	166
第十四章 临危不乱	183
第十五章 人间一席酒	203
第十六章 第二次抬轿	215
第十七章 出走	228
第十八章 指南针和方向盘	241
后记	270

题 叙

在我们这个多事的世界上，生活着一个叫阿通的好人。说他好，当然是相对而言。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。既然连“绝对真理”、“绝对权威”都是谬误的，那么，我们的阿通也只能是相对的好人了。笔者之所以要开宗明义地郑重声明这一点，是为了避免将来有人要给阿通贴标签。恕我直言，中国这些年来的文坛上有贴标签的坏习惯。而任何标签对阿通都是不太合适的。阿通就是阿通，这是毫无疑义的。

阿通是中国的名字，当然也就属于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了。这个道理，本来就像 $1+1=2$ 那么简单明了，那么通俗易懂。但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，阿通是不是中国人也受到怀疑。因为阿通的生理上有个引人注目的特征：他的头发不一般化。不知读者诸君研究过没有，一般中国人的头发是柔软的、平铺直叙的、非常可爱的。但是阿通的头发与众不同，是天生的波浪式而且有点鬈曲。这一点使他显得出类拔萃，也给他招来了很大的麻烦。当阿通从造反战士变为“牛栏”里的“牛”之后，有“考证癖”的专案人员从阿通的头发上入手，想从这里打开阶级斗争的突破口。他们十分认真、十分仔细地考证和审查过阿通的头发，怀疑阿通和外国人有无血缘关系，可否构成“特嫌”或“里通外国”的证据。但是，查来查去，使专案人员大为失望：阿通不但是纯种的中国人，而且思想也纯，他那恰如其分地长在四方脸盘上的无可挑剔的中国式鼻子，就毋庸置疑地证明他是轩辕皇帝的

后代。总而言之，阿通纯粹是中国货。

至于阿通为什么生着那种不正统的头发？在文化大革命中，翻遍阿通的档案，查遍阿通的检查交代材料，都找不到答案。不但专案人员没法下结论，恐怕连阿通本人也不明白其所以然。过去人们问他，他只是理直气壮地说：

“爹妈生下来就是这样的，改得了么？你要怎么样？”

如果人们取笑他，他就会愤怒地说：

“我的头发碍你什么事啦？你妈个×！”

尽管人们怀疑了多少年，考证了多少年，阿通的头发为何不一般化、大众化的问题依然是一个悬案。史无前例的运动轰轰烈烈地搞了十年，连阿通的头发都没有搞清楚，这是可悲的，也是可叹的。

阿通是个工人。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，这是宪法大典上明文记载着的。阿通当然是属于这光荣的领导阶级的光荣的一员了。可是阿通自己并没有体会到这种光荣和重大责任。他连自己的思想都领导不了。他是个有点神经质的人——在这一点上，我们这位可爱的同胞和我们可敬的作家们有共同之处。据说，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们大都是有点神经质的人——容易兴奋激动。阿通一兴奋起来，思想就要出轨，一出轨就要出乱子，一出乱子就要给自己找麻烦。最糟糕的是他只属于“阶级”而不属于“领导”，也就是说他没有和“长”字挂上钩。如果阿通当了官，成了什么“长”，恐怕麻烦事要少一些。生活中不是有一些“永远正确”的官儿么，这种人不论什么时候都是正确的。真理永远掌握在这少数人手里，没有什么麻烦。就是出了麻烦也可以凭借手上的权力巧妙地把麻烦一推，自己心安理得，高枕无忧，半点麻烦都没有。但是阿通没有这个权力，他只能制造麻烦，或者替别人分担麻烦，也就是说，他只能领导麻烦。

阿通是善良的、勤劳的、勇敢的。有时挺精明，有时很愚蠢。他具有一般中国人的很多美德，也有着中国人特有的一些缺点。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完人，只有蠢才才认为自己是完人，阿通决不承认自己是蠢才。但是他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缺点。他在任何场合都是理直气壮、昂首阔步——不论他当农民还是工人，也不论他当造反战士还是当“牛栏”里的“牛”，他都是这个样子。他身体很好，消化功能十分正常，从来没有知识分子那种“思想复杂症”，不会神经衰弱，不会消化不良，也没有生过痔疮，更不知失眠为何物。他想睡马上就能睡着，和你讲着话他也会对着你打呼噜——如果他觉得听你讲话不如睡觉舒服的话。连专案人员对他训话时他都能睡着。平常开大会时，阿通喜欢坐在前面，因为坐在前面显得自己重要。但是台上的人在不断讲话，他就在台下不断“点头”。他“点头”是由于脑子处于睡眠状态时，颈部的肌肉一张一弛，形成了这样的自然节奏。由于阿通性格上和生理上具有这些美德或缺点，所以阿通很少有什么病。他的体重在高峰时达到一百四十斤，低峰时也不下于一百二十斤。他宽肩广额，鼻扁嘴宽，时常笑嘻嘻的。看上去很有福相。如果他不死，有得活哩。不幸的是，后来我听说阿通被弄回乡下之后，死了。但是，我对这个传说一直是将信将疑。因为阿通这样的人是不会那么轻易地去见上帝的。我决不是说阿通是个不朽的人物，但是阿通还没有达到他该死的年龄，到现在他才四十多岁，不论从他的体魄、健康、精神、气质、德行、品格、处事、为人看来，阿通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里还要活很长的时间，你就不想他活也不行。总而言之，阿通还没到他该死的时候，他没有任何理由这么早死。因此，我对这个传说一直持怀疑态度。有一次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问一位专案人员：

“×同志，阿通是不是真的死了？”

他似乎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只是闪烁其词地说：

“听说——阿通是死了。”

这“听说”两字，很值得推敲。虽然在那昏乱的年头，我们许多可爱的专案人员往往靠“听说”这两个字和一面之词去抓人打人、定人重罪或置人于死地，但是现在经过拨乱反正，靠“听说”来决定阿通的生或死，就说过去了。再说，在十年浩劫中，死去活来的人多的是，生与死的概念搞得相当混乱。我总这样固执地认为：阿通没有死。说不定他哪天又突然笑嘻嘻地出现在我面前，怀着十分亲切的善意，笑嘻嘻地对我说：

“老丁，妈你个×，你还活着哪？还在写什么鸡巴毛，你不怕死？”

如此这般地亲切地开导我一番——因为阿通喜欢开导人。他的开导既不能使人心悦诚服，也不会使人啼笑皆非，他对人总是善意多于恶意。

但是，关于阿通死了的消息，不知为何在厂里广泛传开了，人们一时间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：

“啊！阿通死了！啊，啊……”

这包罗万象的“啊”声，使人猜不出是悲还是喜。那些年，中国的老百姓已经习惯于用这不置可否的“啊”作为表态的方式。阿通如果真的死了，他在天有灵，知道他之死，只能得到这个模棱两可的“啊”字和几个极为平常的感叹号，他也会深深感到悲哀的——假如他有悲哀的话。

我和阿通是好友，这个“好”，也是相对而言。只是区别于我十分憎恶的那些人，例如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和他们的帮子帮孙、流氓恶棍、学阀文痞……之类的货色。我虽然很早就认识阿通了，但我和他的工种职务不同，工厂里隔行如隔山，我们算不上深交。是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，才把我们轰到一起的。那时候，我

们虽然朝夕相处，但身份不同：我是“牛鬼蛇神”，他是看守我们这些“牛鬼蛇神”的“看牛郎”，拿着红白两色的水火棍监督我们劳动。后来我离开“牛栏”，升格为人，阿通已荣升为“造反司令”牛祥的忠实保镖，在武斗中他是打头阵的人物，听说还救过“造反司令”的命。“造反司令”成为省革委副主任时，人们都以为阿通也要发迹了，要成为重要人物了。但是到一九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时，我再次被关进“牛栏”不久，阿通却莫名其妙地从上升的阶梯上骨碌碌地滚了下来，跌进“牛栏”，成为我们的“牛友”——被专政的对象。我之说他好，或者说引以为友，是因为他看管我们的时候，没有那么坏。他是绝对忠于职守的。经常警告我们要老老实实、规规矩矩，不准乱说乱动。我们每天对着领袖像履行“请罪”的礼拜仪式时，他都十分严格地检查我们弯腰是否弯到恰当的弧度，并随时加以纠正。但是阿通从来不易打人骂人，有时甚至还和我们这些“牛”们讲几句笑话。有一次，他让我在“早请罪”时背诵了“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”这段“最高指示”后，却笑口吟吟地对我做“启蒙工作”：

“你呀，真笨擦，既然你知道有人发明小说这玩意是用来反党的，你还写这些鸡巴毛小说干嘛？你呀！捉虫入屁股——自找麻烦。你看我，我就不写小说——砍我的头也不写！凡是反党的东西我是坚决不干，坚决反对的！我连小说都不看，所以我问心无愧，我吃得好睡得香，‘一觉睡到日西斜’……”他快活地唱起“样板戏唱段”来了。京调粤腔，唱得十分别扭，但是阿通唱得十分得意。唱完之后，又顺手把吃剩的一个馒头送给了我，并郑重地叮嘱我：要多活几年就千万别再去写小说了。从这些小事可以看出，阿通对我们这些“牛”们还是有恻隐之心的。那年头，能对我说几句真心话的人我就认为是好人，阿通好，就在这里。

后来，阿通落魄倒霉，成为我们的“牛友”时，他那无忧无虑的性格使我们很和他合得来。他憨直忠厚的个性、微笑着的尊容和他说话时的腔调，很能解除生活在“牛栏”里的人们的深深的寂寞。由于我和他关在同一个“栏”里，我们就很自然地成了朋友。他把他一生的经历和值得缅怀的往事都毫无保留地向我倾吐了。他的检查交代材料写来写去只有两页纸。有一次他上厕所时，还稀里糊涂地把这两页纸抹了屁股，结果只好重写，写些什么他又记不清了，弄得他很伤了一番脑筋，而到他被遣送回乡，他这份短短两页纸的检查材料还没有写完。尽管他对写东西——特别是写检查交代材料——很不感兴趣，写得超乎其短；但是他和我谈的情况却可以写成一本书。阿通之所以能和我置腹交谈，一是由于他有爱说话的习惯，他不说话就简直活不下去。二是他认为我不是“混账东西”——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。而我也认为阿通不是“混账东西”。我是“阿通的好友”之谓，就由此得来。

到了一九七八年，“四人帮”倒台两年之后。阿通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。他似乎被忙碌的世人遗忘了。落实政策、平反冤案似乎都没有阿通的份儿——至少我没有感觉到这一点。由于阿通没有结婚，没有家眷，因此没有人写信给《人民日报》或者上诉人民法院要求为阿通落实政策，下个结论。如果阿通真的死了，自然不会写信告状。如果他不死，他向来也懒得写信的，好像他从来就没有收到过谁的信。阿通像堕落在喧嚣的尘世间的一粒灰尘，来得渺小，去得渺然。不过，我曾经是和阿通共过患难的“牛友”，他的音容笑貌、所言所行，都在我心中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象。有时想到阿通，就觉得心里头有愧似的。我一直想为阿通写点什么，不论阿通死了没有，也说明人世间还有我这渺小的人没有将这位渺小的同胞忘记，同时也希望我们

这些健忘的同辈人，从阿通的荣辱升沉的遭遇中去思索一些东西。但是，想来想去，又觉得很难动笔。之所以难，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：

阿通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，恐怕连“中间人物”都够不上。要写他，从文体上就很费踌躇，写传当然不行啰，因为他不是国家要人，不是将军或者省委书记，也不是学界名流或文坛巨子。从报刊杂志中是绝对找不到阿通的名字的。由此足以证明阿通是不可经传的人物。他没有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，又没有令人崇拜的雄才大略或者匡世济民的仁纲德政。他只是个无足轻重、何足道哉的小人物，当然不能入传。如果不信，你写个《阿通传》或者《张三传》、《李四传》送到编辑部去试试。编辑同志准会以为作者发了神经病，毫不留情地把稿子丢到字纸篓里去。写一篇新闻报道吧，阿通又不是新闻人物，他的事迹太平凡了。我从来没有听说阿通搞过什么技术上的发明创造，也没有听说他在台风到来之前冒风斗雨去抢救水泥，或者洪水上涨时用身体去堵决口这类催人泪下的英勇行为。当然，说阿通从来没有做过好事也是不对的。在大炼钢铁时他连续苦战过五十二个小时，放过“卫星”；有一次大街上一群人和流氓打架时，他奋不顾身地投身进去干了一场，他是完全出于正义感的，但是结果发现他打错了人，把好人当作流氓来打了，终于被抓到派出所去教育了一番才放了出来。在文化大革命中，阿通也是做出了贡献的，为了捍卫“无产阶级司令部”，他成为煮糍糊的一等好手。在武斗时，为了捍卫“革命路线”，他几乎被流弹打穿了屁股，表现出十分坚定的“革命坚定性”。阿通也不是不爱学习的人，虽然他宣称他不看“鸡巴毛小说”，但是他读过“老三篇”，背得出十五至二十条“语录”（精确的数字待考）。在清理他的抄架（因为阿通没有家，只在集体宿舍占了一张架子床，所以只能叫抄架）物资

时，还发现他有一本“活学活用”笔记，上面密密麻麻地记满了他的“学习心得”。不过，他那些“学习心得”，我实在不敢恭维，其思想之混乱、内容之矛盾、词义之不清、文字之拙劣以及“最”字之多，达到“顶峰”的程度。虽然这类东西过去曾经风靡一时，成为不少人升官发财的捷径，但是如果把他的笔记拿来发表，也准是谬种流传，贻误后世。阿通的优点还很多，譬如他上下班准时，干活肯卖力气；他对公家的财产还是爱护的，没有把架子床上的床板拿来做法柜，没有用公家的钢管做鸟枪，甚至他还抓过一个小偷，等等。但是阿通又有不可原谅的劣迹：三年经济困难时期，他伙同一些人偷过农民兄弟的番薯，几乎酿成一场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大战；在轰轰烈烈的破“四旧”中，他剪过女同志那不合乎“革命尺寸”的裤脚，使得有些女同志哭得像泪人儿似的。他还有个不可原谅的劣迹，在图书馆的报纸堆里拉过屎，在书堆里撒过尿，这种连暴君秦始皇都干不出来的事，阿通干出来了。这有辱斯文的人物，不属于新闻学的范畴，就是最老练、最有良心的新闻记者也难将阿通的生平事迹撮成一篇新闻报道。

要不，把阿通写成小说中的人物吧，但是阿通既不是四化闯将，又不是当代英豪，也不是流行小说中的时髦青年或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，这样的人物值不值得写成小说，我深表怀疑，因此，要写阿通，就确乎其难了。此其一。

第二，阿通的成份很难确定。纵使文学作品允许写阿通这样的人物，但是过去我们文学作品中的人物，首先要讲人物的阶级根源的。又往往把阶级根源和阶级出身之间划上等号。如果阿通是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，或者是叛徒、特务，这好办，把阿通写成反面人物就可以了；如果阿通家庭出身很好，那也好办，把他塑造成英雄人物就行了。我们不少文学作品常常是按照“血统论”来塑造人物的。这样做，当然是既保险又正确。但是涉及到阿